

# 文化

## 周刊

总第181期

5版

### 文化简讯

#### 柘城文化研究会到柘城进行文化调研

本报讯(记者 赵若羽)为传承柘城文化,发展柘城文化产业,10月17日,原市级老领导史培德、高道春、朱永勤等带领商丘市柘城文化研究会部分会员,对柘城文化进行调研。

柘城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已有2200余年建城史,共有名胜古迹210多处,馆藏文物1800余件。调研组一行先后查看了孟庄遗址、天工金麦草画、泥人李彩塑、白瓷塔苑等文化的现状,他们认为柘城文化是商丘“三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柘城能进一步保护保护措施,把柘城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打响文化品牌,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让更多的人了解柘城。据了解,商丘市柘城文化研究会将与商丘市博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继续关注柘城文化发展,团结更多的柘城文化爱好者共同推进柘城的文化建设。

#### 张永乐当选河南印社副社长

本报讯(记者 杨城)经过认真筹备,10月6日上午,河南省首家省级印社——河南印社正式成立,并举办首届河南印社社员作品展。我市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张永乐当选为河南印社副社长。

据了解,河南印社首期社员50多人,分别由来自篆刻作品进入国展或西泠印社展中的河南或部分河南籍作者组成。我市青年篆刻家王继涛、宋玉磊分别当选为理事、社员。

#### 钧瓷珍品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16日起与公众见面。展览将持续到明年8月。

展览以故宫博物院藏历代钧窑和仿钧窑(釉)瓷器为基础,辅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等单位借展的传世品及对钧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钧窑瓷器和标本,展品共计125件(套),其中3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钧窑是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规模庞大的重要窑场之一,其遗址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境内。

策划 袁正建  
编辑 蔡慧慧  
E-mail:shqcmh@126.com



# 把酒话桑麻

◇ 陈玉岭

雨后天晴的一个傍晚,永城的几个文友相约到郊外的一个露天餐馆喝酒聊天,酒桌就摆在门前的桑树下。天气很好,大家的心情也很好。聊天的范围开始是漫无边际的,从远古一直聊到当下,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酒到忘情处,不知是谁起的头,首先发起了感叹:浩浩乾坤,苍苍人寰。匆匆岁月中,茫茫大地几度沧海桑田;滚滚红尘里,小小地球数次地覆天翻。但无论世事如何嬗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总会留下一些风景,“把酒话桑麻”便成了我们议论的主题。

还是在很古的时候,那时永城这个名字还未出现就有桑了,是以社的形式。社的作用开始主要用于祭祀,后来演变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太丘社(就在今天永城市太丘镇所在地)是最早建立的社之一,也称太丘桑林之社。《周礼》记载:“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社可根据当时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而命名,之所以称太丘桑林之社,是因为当时社坛的周围遍植桑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太丘桑林之社曾经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商汤即位后,国内连年大旱,江河枯竭,寸草不生,商汤就命史官在太丘桑林之社摆上祭品,祈祷上帝降雨以救万民。为了表示他的虔诚,并引咎自责。但事与愿违,旱情依然蔓延。史官占卜后对他说:只有用人作祭品,上帝才肯降雨。商汤认为求雨本是为民,岂可再残害于民,于是便决定由自己充当祭品。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斋身祈祷。祷毕,商汤便坐到柴堆之上。正当巫祝点燃柴堆时,大雨骤然而下,万民一片欢呼。

人们为了颂扬商汤的德行,就创立了一种乐曲和舞蹈,乐曲便取名为“桑林”,后人称其为“汤乐”。舞蹈亦称桑林之舞,在中国的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失传了。后来在太丘汉墓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面上一男子在前面舞动着缙纱领舞,另有五名男性跟着起舞,后面一人擂鼓,场面极为夸张而浪漫。据有关专家认定,那就是桑林之舞的一个场面。可见商汤在太丘桑林之社做了这么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事,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对于当地的社会发展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桑蚕业的发展。在那几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农耕文明解决了吃饭问题,栽桑养蚕就解决了穿衣问题,这也是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永城历来被称为膏腴之地,历史上桑蚕业的发展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永城清·光绪二十九年县志》载:“永邑乡村多种桑,蚕成,妇搯搯丝织绸,名曰土绸,坚白异常。《汉书》云:‘淮渙之水出文章,宗庙黻(fú)黼(fǔ)衣裳用焉。取其质坚而暖,年久不散也。’魏武帝云:‘声价当在蜀锦吴绡之上。’”

这里所说的“文章”,并不是指著书立说,而是永城所产的一种丝织品。红色与青色相配称“文”,红色与白色相配为“章”,“文章”是指色彩斑斓、多种多样的丝绸。永城城北是古睢水,城南则是古涣水。清代诗人蒋梦笔在《土绸行》一诗中是这样描写的:

城北睢水南涣水,睢涣之间养儿子。  
蕴得灵气波光寒,洗出土绸光练起,烂如太乙然青藜,皎如萍花白鸂鶒。

尾。直肃清庙百工心,衣裳用为非无字。制为黻(fú)黼(fǔ)样鹿麋,风吹不动身如玉……

诗中的“蕴得灵气波光寒,洗出土绸光练起”,是指城南的莲花池,那是专门用来浣沙洗丝绸的地方,只有用那地方的水漂洗,丝绸才能“烂如太乙然青藜,皎如萍花白鸂鶒”,而用其他地方的水来洗,光鲜度与颜色就大打折扣。由此可见,无论土质和水质,永城都十分适宜栽桑养蚕。直到解放初期,还几乎家家养蚕,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永城不仅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而且缙丝纺织也颇具规模。史书载:唐代永城所产的丝织品,在全国划分的八个等级中名列一等;明洪武、永乐年间,永城的丝绸曾被作为贡品;民国5年(1916年),永城县署开办了永城乙种蚕业学校,因匪患及战乱影响,民国10年停办。可是民国20年(1932年)8月,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为了培养蚕桑技术人才,永城县置于城内黄学,又开办了一所农桑职业学校,并在县城东关拔地建桑园苗圃,供学生实习所用。要知道,那可是整个商丘地区唯一的一所农桑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桑技术人员……

永城因背倚中原而成其大,因文明积淀而成其厚,也因栽桑养蚕而成其名。酒起雅兴,自然唱和,于是不约而同地就想起了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了出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是被故人以“具鸡黍”的农家风味邀至田家的,这就更显示了朋友之间的真诚。我们是互邀到郊外,形式不同,内容却是一样的。如果说孟浩然他们的“话桑麻”,更多的是对田园风光的留恋与顾盼,而我们则是对故园风物充盈内心的陶醉与向往。

把酒清谈,说过了桑,接着话麻。永城麻的历史也和桑一样久远。《诗经·周南·葛覃》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漙……”这是关于麻较早的史料了,不仅记录了葛麻的形态,生长状况,还记录了把葛麻刈回来如何进行脱胶。上面的记载虽然不能说是特指永城,但至少和永城的情况非常相似,或者说包括永城在内。永城境内产三种麻,青麻、紫麻和苘麻。田间地头,沟河坑畔,到处都有它们的影子,也就是“施于中谷”。《诗经·陈风》里还有这么一句话:“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这种沤麻的方法,采用的是池水沤渍脱胶法,直到解放前,永城农村还普遍采用。

永城之所以被称为汉兴之地。是因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缘故。西汉《泛胜之书》记载:“夏至后20日”沤麻。这又和永城沤麻的时间大致是吻合的。此时正值阳历的七月份,气温较高,适宜于细菌繁殖。永城沤麻就在“东门之池”或南门之坑,把麻放进池水里,用池里的泥埋在上面,一定要埋得严严实实,如果有露在外面的,则沤渍不透,麻皮太硬,还需进行二次脱胶处理。反过来也不能沤渍得时间太长,沤得过头,麻则烂而纤维不坚,大致需五至七天左右。

永城所产之麻,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搓绳。用来打水、捆绑东西、拴牲畜、搭建房屋等;二是纺一种粗线。用来纳

鞋、织麻袋、织口袋、织草帘子等;三是织布,供人们制衣之用。因为古代蚕丝织品是统治阶级或有钱人的奢侈品,一般人人家是穿不起的,就只能穿比较粗的麻。至今永城谁家死了老人,儿孙们都要“披麻戴孝”。由此也可以反证,麻既然可披,当然可以穿了。

在永城境内古芒县、太丘及建成侯国遗址出土的筒瓦、板瓦的凹槽内,发现了里面垫衬的葛麻布,是为了防止瓦粘连而垫的。从布纹的细密程度看,说明那时永城纺织技术已十分先进。这还不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永城人的先祖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纺织工艺上做到了巧拙互用。用苘麻、青麻和紫麻搭配,在麻布上反复摸索,织出了许多精美的图案,如花草树木,鱼虫蝶鸟等。更为神奇的是,用几种不同颜色的麻线,在白细的苘麻布上,以花草与动物组合,织出了喜庆吉祥的图案,如喜(鹊)眉(梅)稍;连(莲)年有余(鱼);五谷丰(蜂)登(灯)等,使本来平淡庸常的日子变得多姿多彩。

有文字记载:元朝时期,国家设有罗局和绣局,明、清时代设有织造府,统管全国的纺织印染行业。永城就有这种专门的机构,管理官方与民间的纺织事宜。所有这些管理层面的建立与完善,反过来也足以证明桑麻在永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是以后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和利用,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桑麻成为永城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注入了一种诗意的特征。在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首诗:“月姥姥,亮汪汪,娘养蚕,多种桑,给儿做身花衣裳。”

金代诗人郭邦彦,金宣宗定兴五年(1221年)曾任永城县主簿,作者下乡视察民情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三首《村行》,有关永城麻的风物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情趣跃然纸上。

一  
寒花初落路尘香,燕掠麻池乍顿顿。  
一片云阴遮十顷,卖瓜棚下午风凉。

二  
芹叶芦花岸两边,约溪石畔绿孤鳊。  
小畦引入平流水,麻杆森森已拍肩。

三  
豆叶芴芴麻叶光,植禾得雨又催黄。  
回家乐事谁真得,牧子行歌醉里狂。

这种被诗化、被深化了的生活,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不知不觉中,夜已经很深了,明月东升,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银白。酒酣耳热之际,谈兴更浓。连饭店老板都被我们的谈话所吸引,他亲自送上来一盘西瓜让我们解渴,并指着旁边的树说:“这是我十年前离开家乡时栽下的桑树,那时我家还是农村,由于城镇化进程迅猛,如今已变为城市的一部分,我也又回到了桑梓之地。今非昔比,确有天壤之别。”说完,也可能是激动,他对着桑树跺了一脚,惊起一树蝉鸣。

这时有歌声从远处飘来,轻柔如月光泄地,圆润如珠落玉盘。美酒,歌吟。我们几个真的都醉了,酒不醉人人自醉。醉在桑树下,醉在月影里,醉在故乡这片多情的土地上……

## 历史烟云

# 宋康王不是昏君(下)

◇ 刘秀森

(上接10月11日5版)

“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这又是《史记》说的宋康王一大无道。国学大师钱穆说这“与孟子、万章之言迥别。盖出一时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其真正是如此。《孟子》记载,万章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以商汤王和周武王以小胜大的例子回答,并说,宋康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君。齐楚虽大,何畏焉?”(见《滕文公下·第五章》)由于戴氏夺取了宋国的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宋国逐渐富强起来,到宋君偃时也要行“王政”。孟子与宋康王同时,且到宋国来帮助宋国成就大业。如果宋康王“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岂会受到力主王政(仁政)的儒家“亚圣”孟子的青睐?可见司马迁采用的这一说法是出于“忌嫉之口”,不可信的。后来晋时的干宝写小说《韩凭妻》,说宋康王霸占了韩凭的妻子,也只是小说家言,根据世俗传说虚构而已。

纵观宋国历史可以发现,宋康王是宋国历史以来最为大胆开拓的国君,而且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这首先表现在他要实行王政的政治改革上(从孟子《滕文公下》可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国学大师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惠)施本宋人,而讲兼爱寝兵,宋康行仁义,宜其贤施。”其次是在军事上进行了改革,“多检壮士,亲自训练,得劲兵十万余。”(《东周列国志》)由此击败了多次侵宋的齐国和楚国,取得了“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魏,有其地”的辉煌业绩,而且灭了齐国所属的薛国,使弱小的宋国变成了“五千乘之劲宋”。《宋策》也记载:“康王灭魏伐薛,取淮北之地。”宋国历史以来多次被楚国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并经常受齐国的气,宋康王取得这样的战绩,是宋国历史以来所没有的。其三是在外交上,面对齐楚两个邻国都决心灭掉宋国,魏国也跃跃欲试的局面,宋康王采取了与秦国和赵国结好的路线牵制强邻,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最终没能挽救宋国,但那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问题。其四是在经济上,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着力发展商业,使天下几百里的土地不但有桑林和漆园之利,而且使以前已是天下有名的商业都市的陶邑和彭城仍然保持着往日的繁盛,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尤其是陶邑,在宋康王时仍被称为“天下之中”,天下最繁华的城市,商业税收为诸侯艳羡。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宋国富强起来,被诸侯称为“膏腴之国”,成为“五千乘之大宋”。

另外,宋国在文化上也达到了鼎盛,先后有像庄子、惠施、宋钎等文化巨人出现。这一现象也是宋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总之,宋国能在那样恶劣的周边环境下达到这一步,使宋国变成了一个七雄之外的中等强国,绝不是昏庸透顶的国君所能办到的。

史实证明,宋国的灭亡,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宋国的南邻楚国热衷于扩张,被秦国逼得不得不东迁后,扩张战略也随之东移,灭了越国后继续向北扩张,宋国便首当其冲。宋国西边的魏国也有心向东,想把在西线跟秦国交战的失利在东线捞回来,也有心向宋国发难。北边的齐国多年来就垂涎宋国军事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富裕,制定了南下攻宋的战略。宋国与秦国交好,与秦国争夺天下控制权的东方第一大国——齐国不允许眼皮底下有秦国的代理人,发誓要把宋国吞下。齐国的周边环境注定宋国要保住自己是很困难的。历代都是诸侯霸主争的宋国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危机显而易见。

内因是宋国在关键时候出了内讧。宋国当时正在鼎盛时期,宋康王将王位让给了太子。齐潜王攻宋,前两次虽召集了数国大军,仍是无功而返。不幸的是宋国在这时出现了内讧。据《战国策》所录的一篇苏秦书信透露,当时宋康王已经让太子执政,自己作了太上王。开始情况还是不错的。《赵策》记载李兑之谓齐王曰:“宋置太子以为王,不措其上而守坚”,后来不知何故宋康王父子失和,据史书记载的迹象看,可能是受了奸臣调拨的原因,宋康王又收回王位,将太子驱逐出国。李兑对太子说:“今太子在,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复攻之,其国必有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齐潜王便抓住这一机会第三次攻宋。有史家推测可能太子党充当了齐国的“第五纵队”,加上宋康王已年老,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能力,才让齐国得逞。

另外,宋康王在用人上也有失误。孟子曾对宋国寄予希望来到宋国,后来因为见宋康王身边的贤人太少而失望地离开了宋国。《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提到宋康王用了唐鞅和田不礼两个不该用的人。《吕氏春秋》说:“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唐鞅是个野心家,挑拨是非把国相戴子赶走而取而代之,没给宋康王出什么好主意,最终因给宋康王出杀好人的坏点子被杀。田不礼是宋康王的大臣,《史记》说,“田不礼之为人也,忍(狠心)杀而骄”。

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有这样一段话:“《韩非子说疑》:燕君于吟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淫于池台榭,外不羸于田猎,又亲操耨以修畝亩,子吟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吟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据此,则燕吟实亦贤君也。以燕吟、赵武灵之贤,可以旁推宋偃。凡其时能感动于学者所高唱禅让让国之美论,而不惜身亲为之者,要之皆一时非常之君,必有其可取之一端,惟宋偃、燕吟皆身死国亡,不如赵武灵尚有功业震撼于当代,身虽不终,而国祚幸保。故宋偃、燕吟独膺世俗诋诮之锋。”“观李兑其民亲上守坚之说,亦足证桀宋之为诬也。”有趣的是,后来秦国等四国灭齐把齐灭宋列为齐潜王一大罪行,也说明齐国灭宋并非是因“诸侯皆曰‘桀宋’”的“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举。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由以上史实来看,宋康王何尝不是这样!史书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六国表》云:“宋亡于齐,其后楚得其淮北徐地。当时盛衰之者,拟之桀纣,盖出诸列国之君耶。而宋之小民,则口道仁义不能忘。凡先秦书记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国史记。而宋以国亡无史,其仁义之设施,已不足自传于后世。”如果宋康王不是“身死国亡”而是成就了霸业,只怕世俗诋诮则不敢沾其身,史书的记载也会幡然两样,司马迁笔下的宋康王也会是另一种形象。正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关于《史记》的不少误记,史学界已有很多人指出。但这也不怪司马迁。在司马迁之前,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长时间征战,幸存的各国历史资料已经不多,且断烂残缺,他写战国史事,主要的依据只能是各国幸存的滕记。史家考评,那些记录不准确之处甚多。司马迁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一一考核订正?宋国因灭亡而无史,对宋康王的记载,只有根据幸存下来的资料和口头传说,供他作为依据的资料又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为了显示政权更迭的合乎天意民心,无不采取丑诋对手的手段,通过捏造和夸张对手的罪恶,把自己的侵略行为装饰成吊民伐罪的堂皇之举;为了不惹民怒,便把敌国的亡国罪归于敌国国王的个人品质。司马迁根据这些写宋国的事,岂会不谬误?但尽管如此,《史记》仍是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伟大的著作。世上从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又何必求全责备两千多年的司马迁呢!而对被历史诬陷的宋康王来说,是应该根据史实还其真面目的。(完)



10月16日,市民和游客穿过开封鼓楼的拱形门洞,逛街赏景。当日,复建后的开封鼓楼正式开放迎接市民和游客。开封鼓楼,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是中国最早的鼓楼之一。1948年毁于战火。2011年,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在园区规划中把鼓楼复建列为首批项目。经过一年半的施工建设,这一象征着古城风貌的标志性建筑终于重新矗立在世人眼前。复建后的鼓楼,高28.8米,共3层,一层城台有五米高的拱形门洞供车辆、行人通过,总体呈现明清建筑风格,成为古都开封的一张文化名片。

新华社发